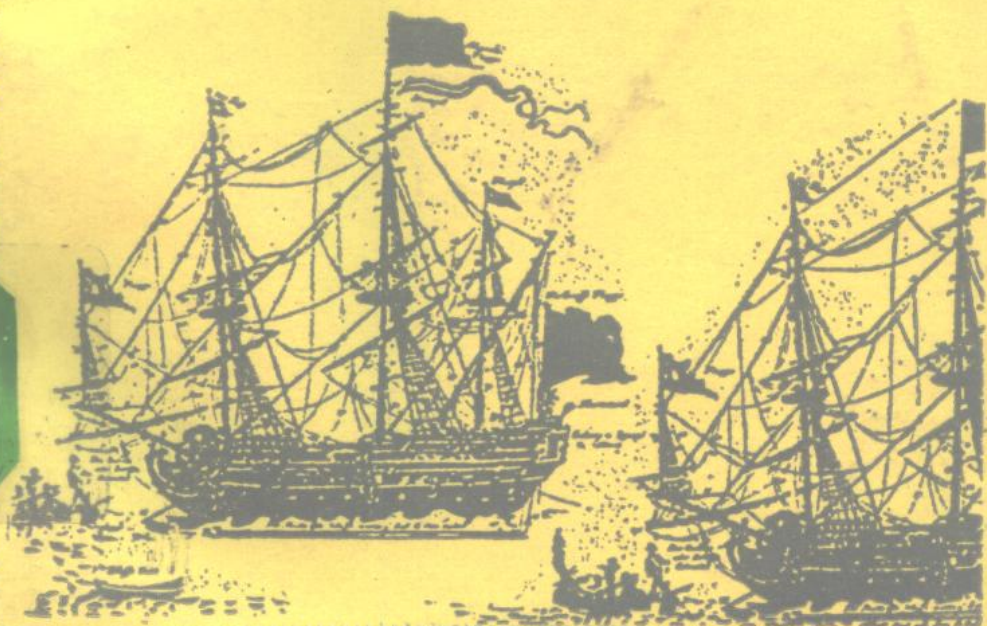


洋務運動史

夏東元 著



K256.1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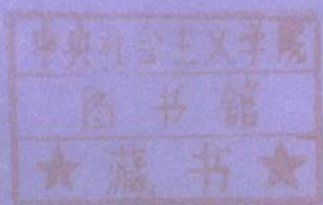
夏東元著

洋務運動史

顧廷龍題



82464



(沪)新登字第 201 号

洋 务 运 动 史

夏东元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25 插页: 2 字数: 440千字

1992年 5 月第一版 1992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本

ISBN7-5617-0847-5/K·082 定价: (平)12.30元
(精)15.40元

前 言

《洋务运动史》的酝酿、发展、变化过程^①是曲折的，单提纲就五易其稿。196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约我写一本《洋务运动》作为青年的读物。我那时正在写“李鸿章传”，因此书与我写“李传”可以结合，故答应了，约写8万字，于1963年冬交稿。这时正是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气氛中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开展之际，这种书的出版当然不会被提上日程（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我将该稿索回，该出版社要我修改寄去，我未应）。书虽未能出版，却启发了我写20万字洋务运动史的动机。我在该书交稿后即拟了一个分为10章的洋务运动史写作提纲。“文革”后上海人民出版社与我议定写一本较大型的洋务运动史，于是在1963年提纲的基础上拟定了新的写作提纲，并按题积累资料。1981年应人民出版社之约，拟订共为28章连“导言”29个单元，打算写50—60万字的《洋务运动史》。1983—1984年间即着手写作，但在写作中，到处遇到总揽洋务工业企业大权的盛宣怀其人，感到如不比较深入地研究盛宣怀，而要把洋务运动史写好，是不可思议的。于是将本拟置于洋务运动史之后写作的《盛宣怀传》提到了前面，洋务运动史则暂时搁下。1987年《盛宣怀传》完稿并很快于1988年出版，于是乃着手写《洋务运动史》。这时又出现另一种想法，即打算将此书写成逻辑发展史，改书名为“洋务运动兴衰成败”，并拟订了12个单元的提纲。以之

^① 关于我的洋务运动史研究体系及其形成过程，请看本书“附录”《我和洋务运动史研究》。

征诸有关同行，一般均认为还是写成《洋务运动史》好，因为它既有系统的知识，又能突出我的研究体系；既是学术专著，又可作为教材，对于读者尤其是青年们帮助更大些；如果改写为逻辑史，势将突出理论而减弱知识性。于是基本上仍按 1981 年分为 28 章的那个提纲加以修订，改为 19 章，即现在本书中的章节。

本书从第一个提纲开始到完稿，经历了 27 年，写作上困难是很多的。所幸有我历届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帮助。他们或收集材料或草拟某些章节，对于我的写作起了不少作用。他们中主要有：于醒民、杨晓敏、黄继宗、赵晓雷、汪智和、姜进、陈彪、吴福环、聂资鲁、易惠莉、沈毅等同志。其中帮助草拟者有：聂资鲁、张能政草拟第二章第三、四节，于醒民草拟第三章相当一部分内容，杨晓敏草拟第四、五、六三章中某些部分，吴福环草拟第十一章中的“开平煤矿”，赵晓雷草拟第十二章中的“汉阳铁厂”，张能政草拟第十四章中的二、三、四节。我的夫人薄芳同志从 50 年代后期起抄写了许多关于洋务运动资料卡片供我在写作中运用，本书中不少附表均出于她之手，此外还作了核对资料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集中了我 30 余年来有关洋务运动的研究成果。对于学术界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吸取则很欠全面，望同行们谅解。

夏东元

1990 年 11 月于华东师范大学寓所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历史趋势	1
一、为什么从“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谈起	1
二、社会经济由制约于封建主义到制约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质的转变	2
三、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变革思潮	8
四、经济规律与变革思潮的汇流——学习西学	16
第二章 适逢经济和思潮变革之会的洋务运动的兴起	23
一、“两害取轻”的抉择	23
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	28
三、坚船利炮的购求	36
四、推动洋务运动全面展开的“练军”	40
第三章 “借师助剿”及其对洋务运动兴起的作用	46
一、“借师助剿”的正义	46
二、“借师助剿”的历史溯源	47
三、上海势力促使清廷对“借师助剿”的默许	52
四、形势骤变和“借师助剿”公开化	60
第四章 近代军用工业之一	
——从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局	67
一、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安庆内军械所	67
二、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局的过渡	
——上海、苏州洋炮局	72
三、“制器之器”的江南制造局创办	77

DQ 69/24

四、江南制造局的建制结构与产品	80
五、江南制造局的资本主义性与民族性	86
第五章 近代军用工业之二	
——马尾船政局	92
一、建造轮船工厂的历史必然	92
二、在与内外阻力斗争中创业	97
三、建造轮船工厂及“衍于无穷”的追求	100
四、马尾船政局的生产和发展状况	105
五、突出人才的重要性及其作用	112
六、船政局发展中的矛盾	114
第六章 近代军用工业之三	
——金陵、天津及各省机器局	117
一、金陵、天津及各省机器局的创办目的及其概况	117
二、金陵机器制造局	119
三、天津机器制造局	124
四、山东机器局	130
五、兰州机器制造局	139
六、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与作用	141
第七章 洋务文化教育的开端	146
一、举办洋务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	146
二、京师同文馆开馆和广方言馆的创办	149
三、京师同文馆招收正途官员学科学及其论争	154
四、各主要同文馆发展简况	160
五、求是堂艺局的创办及其发展	170
第八章 洋务路线的改善及战略性转变	177
一、列强从加强经济侵略到新的武装入侵	177
二、由求强到求富的思想转变	179
三、由“制内”到御外侮的战略性转变和对海军海防建设的强调	185

四、洋务派集团的新构成·····	189
第九章 由求强到求富的过渡——轮船招商局 ·····	192
一、创办轮船航运局的目的和“公局”成立·····	192
二、官督商办名义下的商办·····	197
三、名符其实的“官督商办”·····	203
四、艰苦竞争与三订“齐价合同”·····	208
第十章 电线电报业的创办与发展 ·····	216
一、适应了时势的需要·····	216
二、抵制列强侵权架线和经营电报的思想·····	220
三、官商两利但以“利商”为本的原则·····	227
四、中国电报局对列强侵权的抵制和斗争·····	232
五、电报的社会作用·····	238
第十一章 采煤工业的兴办和发展 ·····	242
一、资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煤矿的企图·····	242
二、针对列强侵权的决策·····	247
三、从磁州转向开平的煤矿开采·····	254
四、基隆煤矿·····	259
五、从广济到荆门的煤矿开采及其失败·····	262
第十二章 金属矿的开采与冶炼 ·····	268
一、开采金属矿的目的及其简况·····	268
二、云南铜矿与平泉铜矿、淄川铅矿·····	274
三、漠河金矿·····	280
四、青谿铁厂·····	283
五、汉阳铁厂·····	286
六、矿业的成败关键·····	294
第十三章 近代海军的筹建 ·····	296
一、水师的历史溯源·····	296
二、以御外侮为目的筹建海军·····	304
三、海军建设与北洋舰队·····	311

四、海军建设中的诸矛盾·····	319
第十四章 海防与新式陆军 ·····	326
一、海口陆上防务·····	326
二、练军的发展·····	332
三、自强军·····	339
四、新建陆军·····	347
五、新式陆军的历史作用·····	350
第十五章 铁路的筹建 ·····	354
一、对列强觊觎铁路修建权的抵拒·····	354
二、自办铁路的认识和尝试·····	359
三、80年代前、中期两次论战与唐胥、津沽 铁路建成·····	366
四、第三次大论战及洋务派内部的争论·····	373
第十六章 纺织工业 ·····	381
一、办纺织工业的指导思想·····	381
二、兰州织呢局·····	384
三、上海机器织布局·····	389
四、华盛纺织总厂·····	395
五、湖北纺织官局·····	401
第十七章 洋务教育的发展 ·····	407
一、由封建教育逐渐向资产阶级教育转变·····	407
二、派幼童赴美国留学·····	409
三、留欧学生的派遣·····	417
四、各类实业学堂的设立·····	424
五、具有实学性质的水陆师学堂·····	430
第十八章 洋务运动与各方面的关系	
——兼论有关洋务运动一些理论问题·····	436
一、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的关系·····	436
二、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	440

三、洋务运动与洋务派和某些洋务人物的关系·····	444
四、洋务运动与外交的关系兼论李鸿章办洋务和外交 的矛盾·····	448
五、洋务运动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关系·····	453
六、洋务运动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关系·····	458
第十九章 洋务运动尾声 ·····	460
一、成功与失败·····	460
二、洋务的继续举办与发展·····	464
三、洋务派与维新派的交叉、交替与异同·····	473
四、对“中体西用”洋务理论的突破倾向 ——兼论张之洞《劝学篇》和《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	478
附录：我和洋务运动史研究 ·····	488
一、洋务运动发展论·····	488
二、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	491
三、选择洋务运动史作为突破点·····	493
四、从经济和人物入手·····	495
五、分歧何在·····	498
六、评价标准·····	501
七、观点的发展·····	503
八、洋务运动史研究的展望·····	505
后记 ·····	508

第 一 章

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历史趋势

一、为什么从“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谈起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洋务运动，是一场清政府为了拯救其垂危统治，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创办和发展军用工业、民用工业企业，编练建设新式海军海防、陆军，并相应培养新型人才为中心，以达到富强目的的活动。因此，不管清政府从事改革的洋务派自觉或不自觉、意识或不意识，他们的言行，在一定时期里是体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要求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我曾对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作过如下的简要表述：

“洋务运动，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趋势中兴起的；是在变落后为先进、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是在清政府遭受太平天国革命和英法联军入侵双重压力面前，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而起步的。这就是说，洋务运动的‘起步’，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

工商业为中心的近代化的改革，却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客观经济规律和作为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的变革思潮要求的。”^①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即：对洋务运动的研究，一方面要将它置于阶级关系中考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要将它置于经济关系、经济规律中进行考察；置于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相互关系中考察。其中道理也很简单，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经济肇其端，又归根结蒂取决于经济的变革；阶级关系来源于经济关系，反过去又对经济关系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在过去一个长时间里，史学界习惯于以阶级和阶级斗争划线，将洋务派、洋务运动划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一边，加以全盘否定。这是由于仅仅把“两害取轻”的“起步”作为概括和评定整个洋务运动的缘故。这显然是片面地运用和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两害取轻”的“起步”，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起步”以后对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却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反映这一趋势的进步思潮要求的。炸药通过导火线而爆炸，不能把导火线当作炸药；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而起作用，不能把偶然性当作必然性。“两害取轻”不过是“导火线”、“偶然性”而已。洋务运动既是顺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必须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谈起。而这，又必须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经济规律开始起质的变化谈起。

二、社会经济由制约于封建主义到制约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质的转变

时代进入清朝，中国的封建主义已发展到了它的末期。自乾

^① 见拙作《论洋务运动的经济背景和思想背景》，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3期。

嘉以还，资本主义因素已经萌芽。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高度发展的产物。在工业方面，商品生产的形式除较大规模的采矿、冶金等之外，主要有两种，一是专业的个体手工业工场，二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副业。此两者，大多是生产同广大人民群众日常最接近、使用最普遍的产品，如丝、麻、棉纺织品和锅、碗、锄等生活、生产用品，故这种行业是最有生命力的，价值规律在这些商品交换中作用也最为明显；加之这些小商品生产者同市场的经济联系比较密切，同商业高利贷资本必然结下不解之缘，这就规定他们中的阶级分化比较迅速而明显。而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必将成为最广泛地生长资本主义的起点。然而，在鸦片战争前封建自然经济结构还很牢固的条件下，这种分化不等于立即为资本主义造成发生发展的前提。因为当时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还很紧密，社会并没有产生足以战胜它们的具有很高劳动生产率的强大力量。汪洋大海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商品生产者的分化，是否为资本主义创造条件，主要要看手工业作坊和工场的发展水平是否已达到可以进行产业革命的程度，而中国的手工作坊及工场的发展，距离这一水平线还是很遥远的。

由于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大作坊所生产的商品远不能战胜个体小生产，这就规定整个社会的商品生产，还必须服从封建主义的经济规律，于是商业资本的积累向封建经济倒流，如吞购田地从事封建地租剥削、放高利贷等，所谓“以末固本”，反使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维护封建主义的作用。这就告诉我们，在鸦片战争前，商品价值规律即使对小生产者起到了一些分化作用，但也并没有为资本主义创造资本、劳动力和市场等条件。这从当时的商品交换情况也可得到说明。据估计，在清代中期以前，1000万两以上的年商品值，只有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茶、盐七种，这七种商品，至少有80%是在农民之间进行交换的。例如，商品进入市场居第一位的粮食，约占七种商品值的40%余；居第二位的是棉布，约占24%；第三位是盐，占

15%。^①商品交换情况，基本上是粮食同盐、布间的交换，这也可说是农民小生产之间的交换，即农民将粮食出售以换取日常所需的盐和棉布；而基本上不脱离农业的盐和棉布的生产者也以此换回口粮。粮食与盐、布两者的商品值恰好大致相当。在这些商品中，作为显示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工场所生产的占极少数。这种情况表明，商品生产和交换，远未能突破封建主义的框子。要使正在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较快，必须使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的作用，从而使封建主义的一些剥削压榨——苛捐杂税、高利贷、地租等——乃至水旱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分化的结果，服从资本主义的需要，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然而，这种封建经济受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制约和支配的情况，是在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廉价商品输入才开始的。

鸦片战争前，以英国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入量是很少的，据统计，年进口总值不过1000万两左右。以4亿人口的大国，区区1000万两的进口商品，对国民经济不会发生多少影响。再说，这些进口商品除鸦片外，主要是毛织品、金属制品和棉花等物，与广大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关系不大，这是造成商品值进口很小的原因之一。其次，由于税收高和其他附加于商品的费用较多，因而缺乏市场竞争力。当时粤海关税率平均达到商品值的20%左右，其中最接近广大人民日常生活的二等白布高达30%余，加上“陋规”的勒索、内地税和落后又昂贵的运输等其他费用，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至少是商品值的150%—200%以上。棉布等低档的为一般居民所需要的商品超过其价值的比率还要高。而那时英国棉布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是比较低的，19世纪30年代只有40年代的30%、50年代的20%有零。如将所有以上这些因素加起来（即较

① 此估计系根据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一文，《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高的产值和附加的高税率、高运输费和“陋规”等），可知棉布等与人们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商品价格是很高的，因而市场竞争能力必然很弱，它无法同土布相较量。这规定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远未能打开并占领中国市场，对封建经济结构不能发生什么破坏作用。相反，外国商品输入和中国土产品输出，都服从封建经济的需要，受封建主义及其国家所制约。

鸦片战争之后情况突变。首先，通过不平等的《江宁条约》及其附约的规定，税收大大降低了，关税只有商品值的5%强，加之内地税“每两不过某分”的规定，最多只有商品值的10%。两者相加，商品只要附加上最高不超过商品值的15%的税款，即可到达消费者手中。而在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子口半税”商品只要附加于商品值的7.5%即可进口，比之战前减少了150%以上。第二，进口商品的价格在中国市场急剧下降，而且，其下降的幅度远超过上述比率数。这是因为，以英国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段时间里，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其中尤以棉纺织品的生产率提高更快：如以1829—1831年平均为100，1844—1846年为323，1859—1861年为615，短短20年间增长3—6倍。劳动生产率提高如此之多和快，就意味商品值的下降，因而附加的所谓7.5%的绝对值也大幅度减少了。这也就决定产品价格下降更多。第三，资产阶级的倾销政策，也是价格下降的重要原因。资本家为了打开和占领市场，往往用暂时亏本销售产品的办法吸引顾客。据1852年米琪尔致港督文翰的报告：英国“曾以低于成本20%—30%的价格，把布匹强销于中国”，有的甚至“亏本35—40%”。^①以上三个因素，规定了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能力大大加强了。

不仅如此，以英国为主的外商们，接受战前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要牢固地占领中国市场，必须制作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

^① 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01、498页。

进行推销,才能在中国社会生根。于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进口的商品,“大半皆呢羽棉布等物”。外国商品开始较广泛地同人民生活直接接触;同封建自然经济基础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小商品生产者较量。沿海地区土制纺织品在冷不及防的情况下,遇到价格低廉商品竞争的突然袭击,很快地衰萎了。向来靠江浙棉布供应的福州、厦门地区的市场,也被“其质既美,其价复廉”的洋布洋棉所占领,造成“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①的局面。江浙既少掉一个福建市场,而上海又是开埠最早洋货直接销售的地区,这个地区的洋布价格,在40年代中期,如经济学家包世臣所记载的“价才当梭布三之一”。本来买土布者多改买洋布了。尽管在1847年后,由于中国人民的抵制和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顽强性,商品输入暂时有所减少,但总的趋势是廉价商品输入日益增多。这些廉价商品、特别是廉价的棉纺织品增多,摧残着中国的手工业。在19世纪40—50年代,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纺织匠因外国的这种竞争而大受其苦,这一点就在全国引起了相当的震动。”^②

的确,这种“相当的震动”,在鸦片战争后不多年即在沿海开埠城市附近显示出来。有所谓“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③的记载,广东顺德县竟至“女工几停其半”^④。这是就某一地方说的。其他还有带全局性的记述,如“纺绩稀少,机轴之声几欲断矣”^⑤。这说明外国廉价商品很快扩展销售到了内地。这些都表示手工业产品抵敌不过洋货而濒于破产。

①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福州将军敬敷奏,引自《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第1卷,第4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42页,解放社1950年版。

③ 见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

④ 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06页。

⑤ 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29页。

据上所述,个体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受到摧残,主要是价值规律使然。地租、高利贷等封建盘剥,以及银贵钱贱、水旱灾荒所遭损失,则起了帮凶的作用。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列强侵入而来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在中国个体手工业者、农民小生产者的破产中日益起着主导的作用。中国社会不再像鸦片战前那样,促使小生产者破产分化的结果仍然是封建主义,而促使阶级分化的因素已日益纳入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轨道上来,实际是为资本主义的发生创造自由劳动力市场和商品推销市场等条件。

同一阶级分化,同一封建剥削压榨促使这种分化,甚至价值规律的作用也有某种程度的相同,但其社会效果却有质的不同:一个仍在封建主义范围内兜圈子,一个则突破封建圈子对社会转向资本主义方向起着推进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常常为人们所忽视,没有认识到,前者是封建主义经济规律占着统治地位,社会经济生活受封建主义所制约;后者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逐渐起着主导作用,日益扩大范围的社会经济生活受资本主义所制约。认识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对于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其间尤其是经济规律,和洋务运动的发生发展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个与此有联系并有某种类似的问题须要说清楚,即太平天国革命促使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和造成小农经济大发展,是否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的问题。关于前者已无疑义,对于后者,学术界则有不同的看法:一方说,小农经济大发展,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另一方说,小农经济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只会对封建主义起维护作用。前者是还是后者对?这同“封建主义经济规律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起主导作用”密切相关。

太平天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确实提高了产品的商品率,这不仅可从国内市场贸易出现繁荣,有的地方“盛于未乱时倍蓰”看出,也可从国际贸易中,太平军占领丝茶产品区后的1863年,丝茶出口量比之战前的1850年,茶增长一